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魏晋南北朝 诗歌史论



傅刚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傅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傅刚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ISBN 978-7-100-13418-7

I. ①魏… II. ①傅… III. ①诗歌史—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06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傅 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3418-7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½

定价:69.00 元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出版说明

学术升降,代有沉浮。中华学术,继近现代大量吸纳西学、涤荡本土体系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因重开国门,迎来了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之下,中华大地集中迸发出学术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的强大力量,产生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出自新一代学人的著作,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精神,不仅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成就先后辉映,也成为激荡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

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我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旨在系统整理当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与突破,更立足于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使其不仅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成为滋养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

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近年又确立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出版宗旨,继上

2 出版说明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系统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近期又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大型学术经典丛书陆续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又一重要接续,冀彼此间相互辉映,促成域外经典、中华现代与当代经典的聚首,全景式展示世界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尤其寄望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6年1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兼笼前美,作范后来”的建安诗歌	6
第一节 建安诗歌的分期	6
第二节 “难以句摘”的汉魏诗论	11
第三节 邨下诗歌——汉诗走向近体诗的历史大转变	18
第四节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曹植	32
第二章 作家主体意识的介入	
——正始诗歌的文人化	43
第一节 迥异于建安诗歌的风格兼论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43
第二节 “清峻”与“遥深”——诗歌的另一种表现手法	58
第三节 “师心遣论”和“使气命诗”——论风力的个性化	75
第三章 近体诗进入历史行程	
——太康诗歌的骈俪化	80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美学要求	80
第二节 太康诗人的写作背景	94
第三节 太康诗人集团论	112
第四节 “规矩”的建立——《古诗十九首》另一个具破坏力的解释者陆机	130

4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第四章 玄言诗

——从生命意识角度解读····· 144

第一节 玄言诗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144

第二节 玄学对作家艺术心灵的培养····· 150

第三节 玄言诗建立的美学境界····· 157

第四节 玄言诗对近体诗的促进

——对玄言诗几种使用手段的分析····· 166

第五章 陶渊明论····· 172

第一节 时代、生活、个性····· 172

第二节 陶渊明自然思想与玄学自然思想的异同····· 175

第三节 一个超时代美学思想建立者的寂寞与悲哀····· 185

第四节 陶渊明诗歌美学论····· 189

第六章 “声色大开”

——南朝诗歌发展的背景描述与活跃状态····· 201

第一节 “声色大开”的历史条件····· 201

第二节 “新变”与“通变”——论两种批评方法····· 208

第三节 新时期诗歌特征····· 222

第四节 南朝审美与躁动的青春期心理····· 234

第五节 流动的复杂化:诗、文、赋的多向选择····· 236

第七章 山水诗

——一个超出本身意义的文学现象····· 242

第一节 不能颠倒的历史逻辑顺序——对“庄老告退,而山水
方滋”的批评兼论玄言、山水的内在联系····· 242

第二节 晋宋山水诗发展透视····· 256

第三节	不仅在于一种题材的建立 ——山水诗的划时代意义·····	266
第四节	山水诗传统建立者谢灵运·····	272
第五节	元嘉三大家的诗歌史意义·····	287
第八章 永明体		
	——近体诗走出帷幕·····	297
第一节	永明声律形成的历史背景·····	297
第二节	永明声律的内容、特征·····	307
第三节	新变意识与创作的自觉 ——论永明体诗人·····	314
第四节	“玄晖诗变有唐风”——论谢朓·····	338
第九章 宫体诗		
	——割不断的历史联系·····	350
第一节	宫体诗义界·····	350
第二节	宫体诗题材的审美价值论·····	355
第三节	契合与距离——对宫体诗的测定·····	369
第十章 作为对峙的北朝诗歌·····		
第一节	作为对峙的北方文化·····	375
第二节	南朝文风影响下的北朝文人诗·····	387
第十一章 魏晋南北朝诗歌总结者庾信·····		
第一节	庾信南北诗风论·····	397
第二节	集六朝之大成者·····	402

6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第三节 启唐之先鞭..... 410

后 记..... 412

再版后记..... 414

绪 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已成为公论。从诗歌史看,特别从形式方面看,由它开始便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体裁五、七言诗的发端。因此,这一时期诗歌的自觉,很大程度上就是五、七言诗(特别是五言诗)的自觉。这自觉表现在:一、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二、对五、七言诗规律的把握。对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的叙述,不能不立足于这两个基本点上。

魏晋南北朝作家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要准确评价这种贡献,首先要确定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即他们生活的时代,在诗歌史中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诗歌传统,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再进一步分析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作用。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这也是公论,但为什么自《诗经》以来会有长达几百年的空白,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仅用采诗制度的崩溃来解释,当然不能使人满意,前人已多所质疑。现代学者一致认为是辞赋的写作吸引了文人注意力,所以从春秋中叶到东汉,诗歌基本上湮没无闻。这样的解释仍然有问题:文人们既然长期无暇顾“诗”,何以到了东汉,一转眼间会腾涌起五言诗这样的新体裁?因此,从四言到五言的转变,其间一定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简单粗糙地下结论。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诗经》是

北方文化的结晶,楚辞是南方文化的产物,两者虽不无相互影响,但没有前后继承的关系。从楚辞以后,作为它的续响,逐渐发展出赋的文体,这便是两汉文学的主要体裁,当日有才能的作家大都投身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现象说明了两汉文坛是南方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北方文化被排挤出文坛,而谋求在学术领域中的发展。西汉政权甫立,高祖刘邦一曲《大风歌》似乎便宣告了楚文化的统治地位,其后的汉武帝刘彻、淮南王刘安也都发为楚声。再就两汉赋作家来看,基本上也都是南方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为蜀人,枚乘淮阴人,严忌吴人。君臣上下同风,这也许是西汉竞作辞赋的主要原因。相反,北方文化却在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仅以《诗》学论,“四家诗”竟全是北人。这些现象的确可以用来说明西汉诗歌不兴的原因。

四言诗为什么会被五言诗替代呢?为什么五言诗一旦产生,竟会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历一两千年而兴盛不衰?锺嵘《诗品序》这样解释:“夫四言文约意广……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就是说四言诗形制短促,容量有限,不能充分地表情达意。只有五言诗能够满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需要。锺嵘是就诗歌的载量而论,然而也说明了新的时代要求与先秦时期的“兴寄深微”(《诗薮》内编卷一引李白语)完全不同了,适应新时代要求,五言诗“居文词之要”,又最有美学意味,所以时代选择了五言诗。明胡应麟《诗薮》说:“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内编卷二)这是综合了形制、声律、风格,于比较中发挥了锺嵘之说。古代学者的研究大都以体会为主,缺乏科学依据,当代学者则以科学方法为基础,具体分析五言诗的美感价值。台湾学者郑靖时根据诗歌句型的节奏比例提出:“五言诗在吟诵的时候,分为三节,如‘松下一问一童子’,七言分为四节,如‘昔

人一已乘一黄鹤一去’，它们的比例都是五比三和七比四，都和节奏美的黄金分割指数一点六一八比一很接近，黄金分割指数，就是最能获得节奏快感的比例，所以五、七言远比四言、六言、八言在诵读时，纯属二比一的单调节奏来得舒畅。”郑文还介绍了杨国枢先生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研究。在《中国旧诗每句字数与其快感价值之关系》一文中，杨国枢先生证明了诗中每句字数对人的生理所产生的“快感价”，有一定函数的关系存在。其实验结果，以五言有最大快感价，三、四、六、七诸言次之，八、九、十诸言又次之，二言与其他诸言皆无快感差异。^①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五言诗何以有巨大的生命力。但接下的问题是，既然五言诗最近黄金分割指数，最具快感价，为何在先秦未得发现，以及在当代社会又失去魅力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问题。汉魏以及整个封建社会选择了五、七言体裁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五、七言诗则因其体制最符合当时士庶人民传达情意的需要而被选择。这种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实与历史阶段密切相关。《诗经》时代由于去古未远，所以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还因袭着原始劳动诗歌一反一复的两拍子节奏，这也最能符合当日“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君子风度，所以四言诗基本上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至于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生活，复杂多变的思想感情，都使它的审美要求迥异于封建社会，五、七言的格律诗只好随着它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五四时期第一个写作白话诗的胡适先生的话来证明。胡适先生在《谈新诗》中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

^① 《中国诗歌研究》，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134页。

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胡适先生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新时代的新精神,只能用新诗体裁来传达,五七言诗属旧时代的旧体裁、旧语言,它的快感价恐与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要求相关。的确,五七言格律诗与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极为相似,无论怎样复杂的情感,都必须纳入它那“规模简重”(胡应麟《诗薮》)的形式里面,受约于它的平仄律。它也不是没有变化,但每一变化又都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它永远处于稳定的结构中。

以上关于五言诗特点的描绘,基本上可以让我们对五言诗的质的规定性进行定义。第一,具有三音节节奏;第二,具有接近于黄金分割指数的快感价;第三,具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表现能力;第四,具有“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①的风格。由于这种质的规定性,五言诗宜于被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作为主要的抒情达意的手段;又由于这种质的规定性,五言诗自它一产生,就注定要走上近体诗格律化的道路。虽然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所致,中国诗歌天然具有对仗的特性,但这还不能保证诗歌的格律化。比如四言诗,尽管也有对仗、押韵,但它那有偶无奇的二音节结构,做不到“宫羽相变,低昂互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而五言诗却可以在节奏音律美的原则下,变化万端,富于美感。又加之五言诗产生的时代,正是文学开始

① [元]杨载:《诗法家数》,[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1页。

独立并进入美文的时代,两汉大赋及散文的骈俪化倾向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先秦以来的诗乐分途,又使得诗歌必须以格律化保持自己的音乐性,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五言诗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由古体向近体的流动。

用“流动”一词,正是本书理论思考上的一个特色。根据五言诗的产生,以及它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全部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是一个不断流动、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盛唐时期,近体诗格律完成定型后,流动才宣告结束。我们在这一流动过程中所确定的五言诗质的规定性和发展方向,正明确显示出魏晋南北朝作家在诗歌发展史中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诗歌传统,我们的描述和评价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章 “兼笼前美， 作范后来”的建安诗歌

建安时代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文学传统说，它继承了先秦以来《诗》、《骚》优秀传统，并体现在五言诗创作中，保证了诗歌的健康发展；就五言诗论，它成功地将乐府民歌转变为文人徒诗，开辟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道路。黄侃《诗品讲疏》论述建安五言诗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兼笼前美，作范后来”的确说明了建安诗歌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建安诗歌的分期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年号，时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但文学史的纪年往往与历史发展阶段不一致，它仅以历史阶段为参考而根据文学的发展规律、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来划分阶段。因此，“建安文学”的名词实际上包括了汉末及魏初的文学，大体的时间是，上限起自黄巾起义(184)，下限至曹植卒年(232)。

黄巾农民起义，是建安诗歌前期创作的背景。这一场起义，基本上摧毁了东汉的统治王权，两汉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地主豪强乘乱而起，拥兵自立，攻伐无端，形成一个个

军阀割据;另一方面,连年战祸,经济惨遭破坏,不仅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旧日上层士大夫也剥尽荣华而同样卷入动荡不安中。曹操在《军谯令》和《蒿里行》诗中分别写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离乱现象,并不仅仅限于百姓。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亲身的苦难体验,自然激发诗人的写作,这些正是建安诗歌早期创作的主要内容。而作为建安诗歌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曹操《蒿里行》、《薤露行》、王粲《七哀》(其一)、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即是。因此,以公元184年作为建安诗歌的上限,是有文学史根据的;至于下限定于公元232年,除了因为它是曹植的卒年外,还由于司马氏集团在与曹氏集团斗争中开始占有优势,而作为正始文学代表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诸人不但已被推入政治斗争旋涡,而且也已开始写作,故宜划归正始文学范围。^①

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概括是:“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很明显,这一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建安诗歌的全部面貌。“怜风月……叙酣宴”一节只是邺下时期诗歌的特征,并不能概指早期创作。因此,要确切描述五言诗的发展,正确评价建安诗歌的成就,有必要进行分期研究。对建安诗歌的分期虽是文学史成为科学以后的事,但事实上古代学者已经有意无意地做过一些探讨。比如严羽用“气象浑沌,难以句摘”(《沧浪诗话》)来概括汉魏诗,胡应麟在《诗薮》中反驳道:“严谓建安以前,气象浑沌,难以句摘,此但可论汉古诗。……子建、子桓工语甚多……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严氏往往汉

① 此据曹融南师说。

魏并称,非笃论也。”(卷二)谢榛《四溟诗话》说:“诗以汉魏并言,魏不逮汉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卷一)姑不论其观点,他们自觉把汉魏分开,是具有文学史眼光的。从胡应麟所引证曹丕、曹植的“工语”作为对比看,他是把建安早期创作并入汉诗中的,这已是对建安诗歌的分期了。清人陈祚明则表达得更清楚明白:“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显然他们都是就诗歌的风格及使用手段所作的分析。这自然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依据之一,此外我们还要根据五言诗流动中的特点,以及它与时代思想、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等关系,尽量如实地划分诗歌发展中所呈现出的阶段。因此,我们将建安诗歌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这是建安诗歌的早期创作阶段。在风格上,这一阶段诗歌大都古直悲凉,未出汉诗范围;内容上多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所谓“汉末实录”(明鍾惺评曹操语)之诗。代表作品如曹操《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孔融《杂诗》、王粲《七哀》三首、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等。这样的划段与有些文学史上所划定的邺下时期有冲突。一般的看法是,邺下时期从建安九年(204)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因为曹操于建安九年攻占邺城,并于此建立大本营,招揽天下的文人学士,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这样的分段无疑具有历史依据,但是它的文学史依据却不坚实,因为它不能清楚地反映出诗歌发展演进的阶段性。如果第一阶段限定于建安九年,那么像曹操《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产生于建安九年之后的古朴质直之诗显然与第二阶段“邺下新声”的风貌不合,何况邺下诗歌的正式写作是从建安十六年(211)才开始。正是依据于从古体向近体流动这一诗歌史特征,我们将第一阶段定于建安十五年。这一阶段的划分,不仅能反映出诗歌发展的阶段性,而且还反映出曹操对于